

政治学原理

课程笔记

2026 秋

目录

1 导论	1
2 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	1
2.1 政治学是科学吗？	1
2.2 两种类型的社会科学	1
2.3 什么是实证科学	2
2.4 概率性与决定性理论	2
2.5 不同类型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	2
2.6 寻求因果关系	3
2.7 政治科学为什么要识别因果关系	5
2.8 如何识别因果关系	5
2.9 写在最后：对政治学“科学性”的反思	6
3 政治及政治学的基本命题	6
3.1 政治学基本问题的缘起	6
3.2 政治学的基本命题	7
3.3 “众人之事”的一个朴素命题	7
3.4 从“三个和尚”现象引出的政治学话题	7
3.5 政治学解决问题的过程	8
3.6 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	9
4 政治分析的人性假设（上）	9
4.1 人性是什么样的？	10
4.2 理性人假设下的社会行为	10
4.3 公共品提供的困境	11
4.4 对人类早期社会的分析	13
4.5 国家的诞生	13
4.6 国家作为公共品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	14
4.7 税收	15
4.8 战争与国家能力的形成	15
4.9 从“流寇”到“坐寇”	15

4.10 国家与汲取	16
5 政治分析的人性假设（下）	17
5.1 柏拉图：哲学王	17
5.2 阿伦特的反驳	17
5.3 柏拉图和阿伦特的比较	18
5.4 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利益的分配方案	19
5.5 中位选民	20
5.6 民主制的其他作用	21
5.7 民主制度运转的现实	21

1 导论

略。

2 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

2.1 政治学是科学吗？

- 从如何翻译“政治学系”窥见一斑：politics, government, political science
- 整体上，政治学由政治哲学向政治科学转变，由定性向定量转变。
- **转变成科学的原因**：围绕特定的问题更加深入的论战，以及对确定答案的追求。
- 体现在通过科学的方法解决学术争议。

2.2 两种类型的社会科学

- **实证 (Positive)** 社会科学 (“世界为什么是这样?”)

以证据为导向，结论由证据得出。

如：实证社会科学（应用经济学、社会学）、比较政治学、政治经济学、公共政策等。

- **规范 (Normative)** 社会科学 (“世界应该是这样。")

以观点为导向，论证围绕观点展开。

如：政治哲学、部分以政策目标为导向的社会科学

例：判断下列问题（实证or规范?）

- 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是在同时期的中国？（**实证**）
- 为什么必须先发展好经济才能建设政治文明？（**规范**）
- 什么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政治模式？（**规范**）
-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哪种手段更有效？（**实证**）
- 为什么民主制度在北美获得成功却在南美经历曲折？（**实证**）
- 怎么样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？（**规范**）
- 经济援助对发展中国家是福还是祸？（**实证**）
- 民主和专制哪个更好战？（**实证**）

2.3 什么是实证科学

科学的假设、命题、理论的标准：

1. **可观察 (observability)**：研究对象或变量能够被直接或间接观测、测量。
2. **可检验 (testability)**：理论或命题能通过经验证据加以检验，即能推出可观察的预测。
3. **可重复 (repeatability)**：在相同条件下，实验或观察能被他人重复并得到一致结果。
4. **可证伪 (falsifiability)**：命题必须存在被经验证据推翻的可能；波普尔将其视为科学划界标准。

如何理解可证伪：一个假设、命题、理论可以被证伪（否定）。

不可证伪的例子：“车库里喷火的龙”，如果无法证明他是错的，那他就是非科学的。然而现实中很多人认为“不可被证伪”是科学的。

科学命题与“对错”无关，可证伪只是一种逻辑条件。

2.4 概率性与决定性理论

理论的定义：对事实的一般规律的总结。

理论分为两类：

- **概率性理论：**注重个体间的相似性，但是承认个体间差异的存在。

例如：高教育水平带来高收入，吸烟有害健康等。

- **决定性理论：**强调预测结果的唯一性。

例如：万有引力定律，牛顿运动定律等。

注意：我们探讨理论的分类时，不在意其本身的对错。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，很难通过个案否定一般规律。我们需要注意区分两种理论的内在逻辑，避免用决定性理论的逻辑去讨论概率性理论。

作为概率性理论的社会科学，可以解答：

- 人类行为的复杂性
- 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属于概率性理论
- 与个体经验、直觉相反的观察未必一定能证伪概率性理论
- 需要更为严谨的研究设计去检验

2.5 不同类型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

- **情形描述：**发生了什么

注意：情形描述不代表研究可以脱离理论。

- **寻求因果关系：**什么导致了什么
- **因果机制解释：**因如何导致果

因果机制的解释多与情形描述相结合。

2.6 寻求因果关系

什么导致了什么，这是社会科学最常见的研究类型。它尝试用某种原因解释一种现象。

例如：个人受教育水平越高，则长期收入越高。

辨析：相关性与因果关系

- **相关性：**两个现象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（A 变化 B 也同时变化）。A, B 可以是连续变量，也可以是离散变量（例如：性别、死亡、是否是民主政体、是否吃了某种药）。
- **例如：**受教育水平越高，收入越高
- **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：**A 与 B 呈现相关性的情况下，A 也不一定导致 B。

什么时候两个事件呈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？

相关性 (Correlation) 不等于因果关系 (Causation)。观察到两个变量同时变化，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个变量的变化导致了另一个变量的变化。常见的原因包括反向因果、遗漏变量偏差、样本选择偏差以及纯粹的偶然性。

1. 反向因果 (Reverse Causality) 两个变量之间即使存在因果关系，其方向也未必与我们最初认为的一致。

例如：究竟是经济发展促进了民主化，还是民主化推动了经济发展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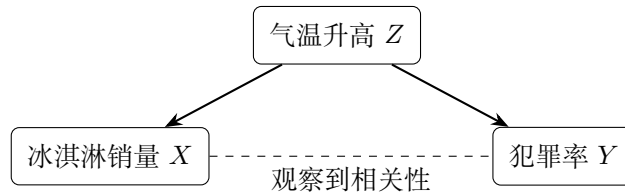
经济发展 → 民主化 或 民主化 → 经济发展

两种机制也可能同时存在，形成双向因果关系。因此，仅观察到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程度正相关，并不能直接判断因果方向。

2. 遗漏变量偏差 (Omitted Variable Bias) 两个变量可能因为受到**共同原因 (Confounder, 混杂变量)**的影响而表现出相关性，但二者之间未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。

例如：冰淇淋销量越高，犯罪率也越高，是否意味着吃冰淇淋会导致犯罪？

实际上，气温可能是一个被遗漏的共同原因：气温升高使冰淇淋销量增加，同时也可能通过增加户外活动等机制影响某些犯罪的发生。



这里的 Z 同时影响 X 和 Y 。如果忽略 Z ，就可能错误地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解释为因果关系。

补充：因果链条 (Causal Chain)

在长链条中，初始变量可以通过中间变量间接影响最终结果：

$$X \longrightarrow M \longrightarrow Y$$

例如，教育可能通过提高个人技能影响收入。即使教育不直接影响收入，也可能通过技能这一中介变量产生**间接因果效应 (Indirect Causal Effect)**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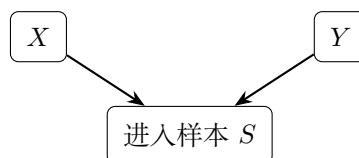
需要区分：**排他性约束 (Exclusion Restriction)** 是工具变量方法中的特定假设，要求工具变量对结果的影响只能通过所研究的处理变量传递，而不是要求一个结果只能有一个原因。

3. 样本选择偏差 (Selection Bias) 即使总体中不存在某种关系，如果观察到的样本不是总体的代表性样本，也可能得出有偏的结论。

- **幸存者偏差 (Survivorship Bias)**：只观察成功或幸存的个体，忽略失败或退出的个体。例如，只统计成功降落者对降落伞的评价，就可能得到过于乐观的结论。
- **覆盖偏差 (Coverage Bias)**：如果通过电话调查人们是否使用电话，未使用电话的人就无法被纳入调查，样本可能缺乏代表性。
- **戒烟与死亡率**：如果发现尝试戒烟的人死亡率较高，不能据此认为戒烟增加死亡风险，因为健康状况恶化本身可能促使人们尝试戒烟。这也可能涉及反向因果和混杂因素。

碰撞变量偏差 (Collider Bias)

如果两个变量 X 、 Y 都会影响个体能否进入样本 S ，那么仅分析被选中的个体，可能在原本不相关的 X 与 Y 之间制造出虚假的相关性。



当研究者只观察 $S = 1$ 的样本时，即对共同结果 S 进行条件化，可能产生额外的统计关联。

案例：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民调

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中，部分民调和选举预测低估了特朗普 (Donald Trump) 的支持度，但需要区分全国民调与州级民调：

- 全国民调总体上较为准确，预测希拉里（Hillary Clinton）在全国普选票中领先，而实际她也获得了更多普选票。
- 部分关键州民调高估了希拉里的支持度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容易参与调查，而一些州级民调没有充分按照教育程度进行加权调整。
- 选举最后阶段部分选民改变投票意向，也造成了预测误差。

这说明**样本代表性**、**无回应偏差（Nonresponse Bias）**和**调查加权**都会影响民意调查的准确性。样本数量很大，也不意味着样本一定具有代表性。

4. 纯偶然（Spurious Correlation） 两个实际上没有因果联系的变量，也可能仅仅由于随机波动，在有限样本中表现出相关性。

例如，某一年电影上映数量与某种疾病的发病率同时上升，并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。

此外，如果研究者检验大量变量组合，就更容易偶然发现统计上显著的相关关系，这涉及**多重检验问题（Multiple Testing Problem）**。

2.7 政治科学为什么要识别因果关系

- 理论需求（学术上）

政治学理论的发展需要严谨的因果分析做实证支撑

- 政策需求（政策上）

如流浪汉和犯罪率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，如果不能得当辨识并给出政策，将会导致恶劣后果。

- 道德需求（实证与规范相统一）

现实生活中很多的歧视与偏见来自于把相关性当做因果关系

e.g. 犹太人。

- 成熟理性公民的基本需求

2.8 如何识别因果关系

如果认为 A 导致了 B，那么需要判断：

- A 是否先于 B 发生？
- 在一个假象世界里，当 A 没有发生时 B 是否出现？（反事实框架）

注意：根据反事实框架，不能评判条件出现前后变量的变化情况，而要判断假设中条件不发生时变量的变化和事实的变量变化。

如何寻找反事实？

赫拉克利特：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”

人不能既做一件事情又不做一件事情，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除了研究条件之外，其他条件都类似的案例进行分析。此外，案例的样本量要大，减小个案引起的偏差。

2.9 写在最后：对政治学“科学性”的反思

- **数据问题：**实证数据获取存在困难，有时只能采用非科学手段，因此科学研究手段受限。
- **隐性价值问题：**事实和价值相掺杂。

e.g. 对不同国家民主程度的测量，首先要定义什么是民主。

- 往往更重视一般规律，忽视个体关怀。

群体间差异由个体均值差异体现，体现的是一般规律。

当数量足够大的时候，不同个体间差异大于群体间差异。

大篇幅用于解释和辨析，字数严格限制。

3 政治及政治学的基本命题

3.1 政治学基本问题的缘起

政治是众人之事，政治学研究的问题具有公共性。群体间会有一些个体不具备的行为，如交流、交换、合作、协调、组织、分配、冲突等等。根据经验，大部分的群体间行为是成功的、非冲突的。群体还会产生个体没有且无法解决的需求。

政治学关注人类群体行为及其后果中涉及支配的问题。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下，有组织的群体行为是政治的起点。

在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中，他提出：人类社会经历过从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的演变。在前一时期，资源自给自足，而进入野蛮时代后，初步积累（盈余，某种意义上即原始资本）随之产生，自然地引起了盈余归谁所有的问题。

接着，家庭随之出现。家庭是最初的社会组织，它界定了私有产权的边界。

家庭的演变：

血亲家庭——普拉路亚家庭（只知其母不知其父，母系社会）——对偶制家庭（存在主要配偶）——专偶制（转变为父系社会）

从血亲家庭到专偶制家庭，私有产权的界定越来越明晰，财富进一步积累，于是阶级出现（雇佣关系），血亲社会“炸裂”，国家出现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观点中，“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”。

财产分配——早期人类组织（家庭）——国家诞生（政治起点）

3.2 政治学的基本命题

“Who gets what, when and how.”

在有限资源的前提下，如何在不同的人（或群体之间）分配资源，以及围绕着资源分配的制度和安排。

e.g. 选举、战争、族群政治（哪个群体享受哪些权利）、官僚政治

3.3 “众人之事”的一个朴素命题

“一个和尚挑水吃，两个和尚抬水吃，三个和尚没水吃。”

已知人多力量大，即人越多喝水越不成问题，为什么现实和原有理论预期有差距？

“理性人”假设：

- 人在给定外部约束的情况下，面临若干行动选项时，会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项。
- 广义的“利益”：既可以指具体的物质利益，也指精神选择。
- “理性人”是一个假设，不是一个理论，无法证伪。
- 该假设是构建理论的必要基础，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和出发点。
- 理性人假设和经验现实高度相符。

根据“理性人”假设，最优的选择是等别人挑来水以后再喝。当一种物品利益由众人共享，但提供的成本由其子集承担，其提供可能会出现不足。这种现象又被称为“搭便车”现象。

问题：设计什么制度解决搭便车问题？试以和尚喝水举例。

明确产权、劳动交易、轮替制度等

事实上，群体规模越大，搭便车问题越严重，越难通过群体内的自发管理解决问题，越需要外部的制度约束。群体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时，“避免搭便车的规则”执行本身也会成为代价高昂的行为，产生新的搭便车现象。

3.4 从“三个和尚”现象引出的政治学话题

- 为什么人民公社失败了？
- 为什么专制制度长久存在？

都在等待别人推翻

这里的机制是：参与反抗的成本和风险由参与者承担，而成功后的收益可能由更多人共享，因此即使许多人希望改变现状，也可能各自等待他人先行动。群体的不满不能直接等同于集体行动；协调、组织和对成功概率的判断同样重要。这只是解释政体持续的一条机制，不是唯一原因。

- 为什么需要有联合国这种组织存在？

一些国家的公共问题的解决（如公海中的海盗、气候问题）有外部性

单个国家承担治理成本，其他国家也可能分享航道安全或减排收益，因此各国都有少投入、让别人多承担的激励。国际组织能够提供协商规则、信息共享和承诺监督，降低合作成本；但建立组织本身并不能自动消除搭便车。

- 为什么医保还需要自费一部分？

避免过度医疗消耗公共资源

自付一部分费用，使个人在增加医疗使用时承担部分边际成本，从而影响使用量。这里的“道德风险”是保险改变行为激励的技术概念，不等于道德败坏，也不意味着增加的医疗服务都没有必要。自付过高还可能压低必要就医，因此需要同时考虑成本控制与服务可及性。

- 为什么要对地方环保部门进行“垂直管理”改革？

如果环保部门归地方管理，地方不愿意为停滞经济发展而去治理（污染不止会污染一个地方，污染物会扩散到其他地方）

可将问题拆成两层：一是地方发展收益与治理成本之间的权衡；二是污染影响越过行政边界，而决策者可能只计算本地收益。把部分监督和问责安排提升到更高层级，可以减少地方保护的影响，并扩大决策时考虑的范围；实际效果仍取决于信息、执行和问责。

- 为什么设置“河长制”？

如果一条河流跨越多个辖区，而治理责任没有明确落实，各地就可能互相推诿，或只处理本辖区可见的问题。明确责任人及上下游协调机制，是为了减少责任分散；它能否有效，还要看治理权限、资源和考核是否配套。

- 为什么帝制时代农民远远多于地主，但是不掌握实权？

帝制时代推翻政权对于农民来说增益小，对于精英来说增益大

更准确地说，这是关于动员激励的一种假设：组织者可能获得较集中的收益，而分散的农民还面临生计压力、沟通成本和行动风险。因此，人数多不等于组织能力强。“农民收益小、精英收益大”不能当作适用于所有历史情境的固定规律，具体分配仍需具体分析。

-

霸权稳定论：霸主出于维护自己霸权的目的进行的行动在客观上可能有外部性

可以把它理解为：某个大国从秩序稳定中得到的自身收益足够大，因而愿意承担较多维护成本，其他国家也随之受益。例如，维护航道可能同时保护本国贸易和其他国家的航运。但这并不意味着霸权国的所有行为都有利于他国，也不意味着公共利益必然被充分提供。

3.5 政治学解决问题的过程

- 发现问题
- 尝试用已知理论解释
- 已知理论不能提供满意解释，尝试构建新的理论
- 用新的理论解释问题，并发现超出现象的一般规律

- 对症下药（应用规律）

这是一个：

从实证（发现并解释问题）到规范（解决问题）的过程

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过程

3.6 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

集体行动，信息不对称，交易费用，可信承诺等概念

这些概念都在解释个体互动如何形成社会结果：集体行动关心大家有共同目标时为什么仍难合作；信息不对称关心不同参与者掌握的信息为何不同；交易费用包括搜寻、协商、监督和执行的成本；可信承诺则关心对方为什么相信你将来会履约。它们并不只适用于某一个学科。

政治学与社会学、经济学理论的互通之处在于对人类行为的研究。早期政治学家都横跨多个领域，一些有影响力的理论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现象有广泛解释力。

e.g. 当一方无法用简单的承诺说服对方时，可能会事先用高昂的代价（承诺成本）来说明自己的意图是真实的。如军事演习，重金聘礼等。

4 政治分析的人性假设（上）

概要：经济人；公共品；国家功能与起源；公共利益分配

小组展示

每周四小组发言，当周不发言成员对其他组进行打分，当周发言小组成员对组员贡献打分，发言内容提前一周公布。

小组的组织形式由小组自行决定。

发言时间：12min

打分原则：对小组打分

教师评分：满分 100 分

同学互评：满分 100 分，低于 60 分需要写明理由

占总评 20%

$$\begin{aligned} \text{展示得分} = & (\text{教师评分} \times 0.5 + \text{组外同学评分} \times 0.5) \\ & \times (\text{组内互评点数}/100) \times \text{超时系数} \end{aligned}$$

4.1 人性是什么样的？

- 在非常早期，人们已经开始对人性进行讨论。此时有很多关于“性善论”的论断，这体现了朴素的理想主义世界观。

如何解释个体不善的行为？

- 现代政治学的观点

亚当斯密：人性利己

人在照顾自己利益和他人利益时，自己的利益占优（也被认为在“自然选择”中占优而被筛选）。

利益的定义：物质利益和其他。

利益的多元性：对不同的人来说利益的定义不同。

案例：登山者遇险，出动警察救援，是否事后收取费用？

不收费 → 道德风险，滥用服务 → 登山者走更危险的路 → 警察不堪重负

收费 → 为了避免这部分费用，部分遇险者不报警（侥幸心理），陷入更大危险 → 导致更大的损失

这两个方向分别体现事前与事后的激励：事前，预期有人兜底可能使人更愿意冒险；事后，预期承担高额费用可能使已经遇险的人延迟求救。设计制度时应分别考察冒险行为、及时求救和救援成本，不能只用“收费能减少滥用”这一个机制作判断。这里是政策权衡的分析例子，不是在断言免费救援一定会导致冒险。

赫尔博特西蒙：理性有边界，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。

回顾理性人假设：人在给定外部约束，面临若干行动选项时，会选择使其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选项。这里外部约束可以是信息储备量，也可以是计算能力等，缺乏信息以及计算能力差，可能导致个体的“理性”行为并不是最优的。

谢林关于人类理性的例子：谢林点

谢林点也称“焦点”：当人们无法事先沟通，却希望作出相互配合的选择时，某个显眼、熟悉或具有共同文化含义的选项可能使预期汇合。例如，两人在校园失联后，都可能想到去最显眼的地标等候。关键不仅是“我选什么”，还包括“我认为对方会想到什么”。它解释的是协调，并不保证解决利益冲突。

注意：“自利”和“理性”不等于善的对立面，该假设不含任何价值色彩。

4.2 理性人假设下的社会行为

- 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否会导致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？ ×

原因在于个人决策时通常只计入自己承担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，没有自动计入对他人的影响。即使每个人都作出自己的最优回应，结果也可能是群体共同不愿看到的均衡。因此要区分“个体最优回应”“策略均衡”和“社会整体更好的结果”。

经典反例：囚徒困境

	B 招供	B 不招供
A 招供	$(-10, -10)$	$(0, -15)$
A 不招供	$(-15, 0)$	$(-1, -1)$

我们发现，A，B 的最优选择都是招供。但是如果 A，B 都招供，两个人的合结果是最劣的。

收益		B	B
		合作	背叛
A	合作	5, 5	-5, 7
A	背叛	7, -5	0, 0

• **问题：**如何避免囚徒困境？

信息沟通，威胁，奖励，重复多次博弈

引入第三方

第三方协调/仲裁：惩罚、奖励实施的关键

第三方的作用是改变激励与执行条件：如果违约会被识别并受到足够的惩罚，合作后的承诺才能更可信。仅仅让双方交流愿望，未必改变背叛的收益；还需要考虑第三方是否中立、是否有执行能力，以及监督本身由谁支付成本。

我们发现，如果想让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，需要设置额外的条件。

注意：重复博弈的本质是合作奖励，通过未来合作的获益来实现。下一次合作只有在当前一轮合作成功的前提下实现。重复博弈要求参与方无法预知博弈的结束时间点。

e.g. 为什么不同宗教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来世的概念？为什么大四学生的分数普遍很低？这都是多次博弈的结果。

4.3 公共品提供的困境

休谟：在设计制度时需要把每个成员都假定为无赖，并设想他的一切所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，别无其它目的

引出著名政治学议题：公地悲剧，集体行动的困境

这里是一种制度设计的审慎原则：不能把制度有效运行完全寄托于掌权者或参与者的善意，而要考虑自利者在规则下会作出什么选择。它不等于经验上断言“所有人都只求私利”；人的道德、信任与互惠同样可能影响合作。

非竞争性：消费行为不减少他人对物品的效益。

非排他性：不能排除其他没有付费的人消费这种产品。

非竞争但排他的物品被称为俱乐部物品，如大学电子图书资源（需要资格）。

竞争性，排他性的物品被称为私人物品。

竞争性、非排他性：公共池塘物品，如无主草场、无主矿场

“公共池塘物品”也称公共池资源或共同资源。捕鱼就是直观例子：难以阻止别人进入渔场，但我捕走的鱼不能再由你捕走，因此具有竞争性。这里的困难往往表现为使用过多、维护不足，和纯公共品的供给不足需要区分。

非竞争性、非排他性的物品被称为公共物品，公共物品的提供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。

表 1: 按竞争性与排他性划分的四类物品

	具有排他性	不具有排他性
具有竞争性 我用后，你可用的减少	私人物品 例：一份食物、一件衣服。 可限制使用者，消费会占用物品。	公共池塘物品 / 共同资源 例：开放渔场、无主草场。 难限制进入，容易过度使用。
不具有竞争性 我用时，不减少你的使用	俱乐部物品 例：不限并发人数的订阅数据库。 可限制非会员，额外使用成本低。	公共物品 例：一定范围内的国防、公共预警信号。 难排除未付费者，容易供给不足。

判断顺序：先问“能否以合理成本把未付费者排除在外”，再问“多一个使用者是否减少其他人可用的数量或质量”。“竞争性”说的是消费上的相互影响，不是生产企业之间有没有竞争。上表按典型使用条件分类。

两个容易混淆的地方：政府提供的服务不一定是纯公共品，例如病床与教室座位具有容量限制；私人组织也可能供给公共品。“由谁提供”“谁拥有”和“消费是否竞争、排除是否可行”是不同问题。物品类型还会随拥挤程度或制度条件变化：同一条道路可能从不拥挤变成拥堵，也可能通过收费站限制进入。

两种困境的区别：公共品的典型问题是“大家都想享用，却不愿为提供它付费”；公共池资源的典型问题是“大家都想多取用，却没有承担资源减少给别人造成的全部损失”。前者重点在提供，后者重点在使用与维护。

公共物品的类型有很多，如连续性公共物品（收益随投入增加而递增），离散型公共物品（投入达到阈值之后才能获得收益）。规模、群体差异性都会影响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。

注意：是否是公共物品的讨论需要建立在确定的群体集合内。如中国的国防对国人来讲是公共物品，而对全球其他地区的人来说则是一种俱乐部物品。

亚里士多德：由最大人数所共享的事物，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

用囚徒困境的思维分析，每个人有两个选择：提供公共物品、搭便车

用囚徒困境理解时，需要说明相应的收益结构：无论别人是否出资，个人都更愿意不出资，但大家都出资比大家都不出资更好。并非所有公共品情境都满足这些条件；如果必须达到门槛才能产生收益，协调谁来出资、如何共同达标也可能成为关键。

族群多样性越多，公共物品提供难度越大，因为都在等其他族群来提供

一种可能的机制是：不同群体对项目优先级、成本分担或收益分配有分歧，互信又不足，于是每一方都担心自己付出后收益被另一方占有。但“多样性必然削弱合作”不是普遍规律；共同规则、代表机制与跨群体信任能够改变结果，仍需经验研究检验。

一个简化的公共品例子：设十个人共同筹建预警系统，每人可选择出资或不出资。每多一人出资，需要由他支付 10 元，却给每个人各带来 2 元收益。对出资者自己而言，新增净收益为 $2 - 10 = -8$ 元；对整个群体而言，新增净收益为 $10 \times 2 - 10 = 10$ 元。因此，个人不出资可以是自己的最优选择，但全体出资时，每人净收益为 $20 - 10 = 10$ 元，比全体不出资时的零收益更好。这个例子说明：私人边际收益小于成本，而社会边际收益大于成本时，分散决策可能导致供给不足。

制度如何改变结果：可以改变分担方式、提高行为可观察性，或引入共同认可的约束。强制性筹资是一条路径；共同体通过规则、监测和制裁实现自我治理也是一种可能，并不只有“完全私有化”和“国家统一管理”两种选择。能否成功取决于具体条件，不能只凭物品名称选定制度。

4.4 对人类早期社会的分析

人类早期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：暴力的泛滥。

原因：财富积累的出现以及对他人财富的觊觎，自然灾害等。

人们的努力：小的共同体（家庭，村落），行业协会，私人物品的购买（雇佣军，镖局等）。

努力的局限性：排他性，规模小（业务规模），成本高昂

排他性（私人/俱乐部物品）

例如，私人护卫主要保护付费者，行会互助主要覆盖会员。这类安排可以满足一部分安全需求，却可能把未付费者或组织之外的人排除在外，也难以独自处理跨地区、跨群体的威胁。因此要分别判断服务是否存在、覆盖谁，以及规模是否足够。

有些需求无法通过私人物品的形式得到满足：比如灭火

火会对邻居也造成损害

关键在于灭火具有对邻居的正外部性：即使邻居没有付费，火势被控制后也可能免遭殃及。消防当然可以有私人供给或收费安排，但只按单个房主的私人收益决定是否救火，可能低估周围人的受益。“无法满足”在这里应理解为可能无法充分、有效地满足，而不是技术上绝对不能私人供给。

4.5 国家的诞生

国家作为人类控制暴力、解决无序状态的方案被创造。

国家的定义（韦伯）：组织支配权的组织，成功地在一定的疆域内，将作为支配手段的暴力的正当使用权加以垄断。

像国家的组织未必是国家（比如我国的铁路系统，因为没有垄断暴力的使用）；有些不像国家的组织反而更像国家。

判断重点不是组织规模、机构名称或是否拥有制服人员，而是它是否在一定领土上成功主张对正当暴力使用的最高控制。国家机构或企业的权力通常来自更高层的授权；某些事实统治组织可能具有部分国家性特征，但实际控制、合法性和外部承认并不能混为一谈。

国家产生后，人们自主让渡了使用暴力的权利，国家可以实行最终制裁。

蒂利：国家是“黑帮”（organized crime）

蒂利的类比强调保护与汲取的双重关系：掌握强制手段的组织一方面提供安全，另一方面能够强迫人们交出资源，甚至可能参与制造威胁。这主要是对欧洲国家形成过程的一种历史解释，不能简化为对一切国家的道德判决。

e.g. 大陆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，这能证明台湾不是一个国家

注意：要区分**国家（state）**和**民族（nation）**的区别。国家是行使暴力的单元，而这不是民族的本质特征。

4.6 国家作为公共品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

- **国家的功能：**抵御外敌，压制权力的竞争者，保护，汲取

其中，“汲取”支撑了前三个功能

军队、官僚和保护活动需要持续资源，汲取把社会资源转化为这些组织能力；这些能力又反过来支撑汲取。理解这四项活动时，应区分解释统治者怎样维持权力，与评价这些活动是否增进全体民众福利。

- **国家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：**安全（对暴力的驯服）（如人为侵害）
- **提供安全的手段：**暴力机构

（警察、法院、军队等）

这些机构的分工不同：军队主要承担军事防卫，警察主要承担治安与执法，法院承担裁判与争端解决。将它们放在同一框架下，是因为其决定与行动最终受到国家强制力支持，并不是说每个机构都以直接施加暴力为日常工作。

臣民/公民放弃对于暴力的使用权

排除紧急情况等

“垄断正当暴力”并非社会中不再发生私人暴力，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允许个人在特定条件下自卫。政治学上的重点是：对暴力何时被认可、如何受约束以及发生争议后如何裁断，国家主张最终的制度性权威。

- **国家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务：**交通、医疗、教育、社会保障等

国家边界不断扩张的过程 → 现代国家越来越强大

（20 世纪以后逐渐开始）

这里的“边界”理解为国家职能和行政介入范围的扩展。随着财政、统计和行政能力增长，国家能够介入更多教育、卫生、保障等事务。但职能多不等于能力一定强，国家能力与权力是否受约束也是两个不同维度。

- 国家提供公共品也有成本。

4.7 税收

税收是国家汲取（extraction）社会资源的重要形式，也是国家行使职能的重要保障。国家通过汲取获得维持军队、行政机构和公共服务所需的资源，其背后既有强制力的支持，也有制度规则、社会认可和政治协商。

- **税收的基础：**税收机关，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，经济统计，人口普查等。

这些制度使国家能够识别纳税对象、掌握其经济活动，并按照一定标准持续征收。因此，税收能力不仅是要求民众交钱的能力，也是获取信息、组织行政和执行规则的能力。

- **现代官僚的基础：**“国家的理性化”。

国家的理性化体现为行政活动逐渐依靠明确的职权、统一的规则、专业人员和书面记录。税收也由临时性的征索，逐渐转变为常规化、可计算的财政收入。

4.8 战争与国家能力的形成

查尔斯·蒂利以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为背景，提出“战争制造国家”的解释。战争需要持续的人力、财力和物资，而临时掠夺难以支撑长期作战。为了维持战争，统治者必须建立更稳定的征税体系，发展行政组织，并加强对人口和领土的控制。

- **战争推动汲取：**军事竞争迫使统治者扩大资源动员，建立征税、核算和行政机构。
- **汲取推动国家组织形成：**持续征收需要官员、规则和执行力量，这些组织逐渐成为国家的常设机构。
- **国家能力反过来支持战争：**更稳定的财政收入和更强的行政能力，又使国家能够维持更大规模、更持久的军事行动。

因此，“战争制造国家”强调的是战争、汲取与组织建设之间的相互促进。统治者最初可能只是为了筹集军费，却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持续存在的国家机构。

征收也可能遭遇社会反抗。为了获得资源，统治者有时需要与社会群体协商，以保护、权利或政治参与作为交换。因此，国家形成既涉及强制能力的集中，也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。

这一过程并非必然发生：战争可能推动组织建设，也可能摧毁生产和财政基础。国家税收能力的形成通常是长期发展的结果，不能简单理解为战争越多，国家就越强。

4.9 从“流寇”到“坐寇”

奥尔森用“流寇”和“坐寇”的区别，解释统治期限如何改变掠夺者的行为。

- **流寇**：流动掠夺，缺乏稳定的控制范围，主要关心眼前能够拿走多少资源。当地未来是否还能生产，未必影响他此后的收益。
- **坐寇**：长期控制一定区域，把当地看作持续的收入来源。当地未来的产出越多，他未来能够征收的资源也可能越多。

例如，流寇可能把粮食和来年播种的种子一并抢走；坐寇若打算明年继续征收，就有理由留下种子，并防止其他掠夺者破坏生产。**变化的关键是未来收益进入了统治者的计算。**

当统治者预期长期控制某地时，就可能把一次性掠夺转变为持续征收，并产生维护秩序、保护生产和提供部分公共品的动机。如果征收过重，导致民众减少劳动、投资和积累，未来的税基也会缩小。因此，长期收益的考虑可能对当前的掠夺形成一定约束。

但是，坐寇追求的仍是自身收益，而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。他可能愿意维护生产，却未必充分保护民众权利；他愿意提供的公共品，也未必达到社会最优水平。当统治地位变得不稳定、预期任期缩短时，短期掠夺的激励又可能增强。

4.10 国家与汲取

国家依赖暴力向民众汲取，并提供公共服务。这其中的潜在假设是：汲取以服务为目的，汲取的度不超过提供服务所需。然而现实是：国家经常超量汲取。

需要注意，税收只是汲取的一种形式，还存在其他多种形式：纳贡、徭役、没收、贪污、规制、制造通货膨胀（超发货币）等。

汲取、保护与约束

蒂利强调战争压力如何推动财政与行政组织的发展；奥尔森强调长期统治预期如何使掠夺者产生维护税基的动机。两者从不同角度说明：**国家的汲取与保护可能相互依赖。**

国家需要资源才能维持秩序，而秩序又有助于维持生产和税源。但提供保护的能力也赋予国家更强的汲取能力，由此产生进一步的问题：**如何在保证国家履行职能的同时，防止其超量汲取并约束统治者？**

怎么理解超发货币是汲取：稀释作用

一个问题：如果国家违背契约，而国家作为垄断了暴力的实体，既是契约的参与方也是执行方，有什么办法？

詹姆斯·麦迪逊的论断：“若政府本身不是对人性本身的绝佳体现，那他还能是什么呢？如果人都是天使，就不需要政府了，如果是天使统治人，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。”

经济人 → 自我利益最大化 → 公共品提供问题 → 国家的产生

5 政治分析的人性假设（下）

国家如何分配公共利益？

国家、公共品与公共利益的存在是现代社会不可回避的事实。个体既需要通过税收等方式承担公共品的供给成本，也能够享受公共品带来的收益，其中可能存在**搭便车问题 (Free-rider Problem)**。

然而，公共利益的分配并不是由抽象的“国家”自动决定的，而是需要由具体的政治行为者作出决策。这就引出了几个重要问题：

- **谁能够代表和发现公共利益？** 不同个体的利益与偏好可能存在冲突，公共利益应如何界定？
- **谁有权决定公共品的供给与分配？** 应当提供哪些公共品、提供多少，以及由谁承担成本？
- **如何保证决策的正当性？** 通过何种政治制度，使公共决策能够回应社会成员的利益与诉求？

5.1 柏拉图：哲学王

柏拉图 (Plato) 深受其导师苏格拉底 (Socrates) 的影响。公元前 399 年，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陪审法庭以不敬神、腐蚀青年等罪名判处死刑。这一事件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苏格拉底质疑缺乏知识和反思的多数意见，而柏拉图进一步发展出**精英统治 (Elite Rule)** 的思想，对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持批判态度。

柏拉图认为： 政治同样需要专业知识和德性，正如航海需要船长、治病需要医生，治理国家也应由真正理解正义与善的人负责，即**哲学王 (Philosopher King)**。

- **知识与能力：** 政治决策具有专业性，不能仅凭人数多少决定谁有资格统治。哲学家通过长期教育与理性思考，能够认识善与正义，因此更适合承担统治职责。
- **防止私人利益干扰：** 在《理想国》中，柏拉图主张护卫者阶层（包括哲学王）受到严格的财产和家庭制度约束：
 - 不应拥有通常意义上的私人财富和私有土地，由城邦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；
 - 不建立排他性的私人家庭关系，子女实行共同抚育，以避免家族利益影响公共职责。
- 通过严格的教育和制度约束，使统治者不受财富、权力欲望及私人利益支配，而以城邦整体的善为目标。

5.2 阿伦特的反驳

汉娜·阿伦特 (Hannah Arendt) 在《人的境况》(The Human Condition, 1958) 中批评了柏拉图以来将政治理解为统治与服从、将政治行动视为实现预定目标的工具的传统。她认为，**政治的本质并非少数人依据知识替所有人作决定，而是多元个体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说与共同行动。**

1. **私人领域 (Private Realm) 与公共领域 (Public Realm) 存在区别。**

私人领域主要涉及个人及家庭的生活需要，如生存、消费和日常劳动；公共领域则是人们共同出现、表达观点并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。政治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私人生活的延伸。

2. 政治不同于生产，而是一种公共性行动（Action）。

阿伦特在《人的境况》中区分了三种人类活动：

- **劳动（Labor）**：满足生存和生理需要的循环性活动，如生产与消费生活必需品。
- **制作（Work）**：按照预先设定的目的制造具有相对持久性的产品，如建造房屋。
- **行动（Action）**：人们通过言说、互动与共同行动参与公共生活，具有自由性、创造性和不可预测性。

柏拉图式的哲学王倾向于将政理解解为一种类似**制作（Fabrication）**的活动：统治者掌握正确的知识，按照理想蓝图塑造城邦。

阿伦特则认为，政治不能像制造物品一样，由单一主体预先设计并完全控制结果，因为政治行动必然涉及其他人的回应与参与。

3. 人的多元性（Plurality）是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。

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经历、立场与判断，人的偏好多元，因此公共世界不能被简化为某一个人的视角。即使哲学家拥有丰富的知识，也不能因此取代其他人的政治行动与公共表达。

- **平等性**：人们具有相互理解、交流和共同参与政治的可能性。
- **差异性**：每个人又具有独特的身份、经验和观察世界的视角。

4. 公共讨论与共同行动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价值。

公共事务涉及多元主体，不应仅由少数人依据自身判断加以决定。人们通过言说（Speech）、讨论与共同行动，表达不同观点，并在互动中形成公共判断和政治关系。

例如：城市是否应当修建一座公园，不仅涉及建设成本和专业规划，也涉及不同居民对休闲空间、财政支出与公共环境的价值判断。技术专家可以提供信息，但专业知识本身并不能完全替代公共讨论。

阿伦特强调**多元性、公共领域、政治自由与共同行动**，反对将政治简化为专家治理或单向的统治与服从。这为强调公民公共参与的**民主理论**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。

5.3 柏拉图和阿伦特的比较

大部分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（比如是否修桥、征多少税），并不存在事先确定的最优解，但可能有例外：

- 以疫情防控为例。疫情防控要以个人的行为为基础（戴口罩、打疫苗等），我们发现戴口罩这个行为是一个个人领域的问题，但是如果国家强制要求，那这就侵犯了个人的私领域。
- 后发型国家的**后发优势**

在某些领域，后发国家可以直接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，直接照抄“最优解”。

5.4 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利益的分配方案

什么是民主 民主（Democracy）是一个规范性概念。

- **民主的渊源**：Democracy 源于古希腊语 *demos*（人民）与 *kratos*（统治、权力），即人民的统治。与之相对的概念包括 Autocracy（专制统治）和 Theocracy（神权统治）。
- **约瑟夫·熊彼特（Joseph Schumpeter）**：强调竞争性选举，认为民主是一种通过争取人民选票获得政治决策权的制度安排。民主的关键不在于人民直接制定政策，而在于政治领导人能否通过选举竞争获得执政权。
 - 熊彼特的另一重要理论是**创造性毁灭（Creative Destruction）**：资本主义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，不断淘汰旧的生产结构、创造新的经济结构，从而实现动态发展。
- **亚当·普沃斯基（Adam Przeworski）**：强调政府应当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，并且执政者必须有可能在选举中失败、失去权力。竞争性选举具有三个重要特征：
 1. **事先不可预知（Ex Ante Uncertainty）**：选举结果在投票前存在真实的不确定性，不能由执政者预先决定。
 2. **事后不可改变（Ex Post Irreversibility）**：选举结果一旦确定，应当得到承认和执行，失败者不能任意推翻结果（如某些独裁者拒绝承认败选）。
 3. **可重复发生（Repeatability）**：选举必须能够定期重复，失败者在未来仍有机会通过选举重新获得权力。
- **道格拉斯·诺斯（Douglass North）**：强调制度与法治对政治权力的约束。即使政府掌握公共权力，其行使权力的行为也应当受到法律和制度规则的限制。

民主的不同理念 根据对民主的核心价值与制度要求的不同理解，可以区分以下三种重要的民主理念：

- **选举民主（Electoral Democracy）**：强调通过自由、公正且具有竞争性的选举产生政治领导人，并允许选民通过定期选举更换执政者。其核心是政治竞争、人民授权与选举问责。
- **自由民主（Liberal Democracy）**：在竞争性选举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强调宪政、法治、权力制衡以及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。民主不仅意味着多数人有权决定公共事务，也意味着多数人的权力受到限制，以防止多数暴政（Tyranny of the Majority）。
- **协商民主（Deliberative Democracy）**：强调公共决策的正当性不仅来自选举或投票结果，也来自平等、公开、理性的讨论过程。公民通过表达理由、交换意见与相互协商参与公共决策，甚至可能在讨论中改变原有偏好。代表理论家包括哈贝马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等。

三者并不完全互斥：选举民主强调**谁有权执政**，自由民主强调**权力如何受到约束**，协商民主则强调**公共决策如何正当地形成**。

民主的实现形式 根据人民参与政治决策的方式，可以区分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。

- **直接民主 (Direct Democracy)**: 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，而不完全依赖政治代表。例如：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公民大会，以及现代国家中的全民公投（如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）。
 - 直接民主通常更容易在人口规模较小的政治共同体中实施；现代大型国家则主要在特定议题上采用公投等直接民主机制。
 - 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参与资格受到严格限制，妇女、奴隶及外邦人通常不具有公民政治权利，因此不同于现代普遍选举权意义上的民主。
- **代议制民主 (Representative Democracy)**: 又称间接民主，是现代民主国家最主要的制度形式。选民通过选举将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委托给政治代表（如议员、政治家），并保留选择和更换代表的权利。

代议制民主涉及一个重要的**委托—代理问题 (Principal-Agent Problem)**：选民将决策权委托给政治家，但政治家的个人利益和政策偏好未必与选民一致。那么，什么机制能够促使政治家制定符合多数选民利益的政策？**中位选民定理 (Median Voter Theorem)**。

5.5 中位选民

安东尼·唐斯《民主的经济理论》

- **假设**：政治家的目的是持续掌握权力 → 需要获得足够多选民的支持
- **目的**：在预算约束下，用较少的开支获得足够多选民的支持
- **做法**：了解选民对公共服务（政策）的偏好，制定能够吸引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政策。
- **中位选民定理的例子**：假设共有 17 名选民，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理想偏好依次为：

0, 1, 1, 2, 2, 3, 4, 4, 4, 5, 5, 5, 6, 6, 6, 6, 6

数字越大，表示偏好更多的公共物品供给，但也意味着更重的税负。假设选民的偏好具有单峰性，并且总是选择政策立场更接近自己的候选人。

现有两位候选人：

$A : 4, \quad B : 6$

- 偏好 0 ~ 4 的选民（9 人）支持 A；
- 偏好 5 的选民（3 人）对 A、B 无差异；
- 偏好 6 的选民（5 人）支持 B。

因此，A 至少获得 9 票，超过全体选民的半数，必然赢得选举。

如果能够将每个选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抽象化为数字：

$$\text{选民偏好} = \frac{\text{希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寡}}{\text{偏好税率}}$$

并将这些偏好数值从小到大排序，政治家应该选择那个偏好位于中位数的选民所支持的政策。（中位选民定理）

该选择可以让不满最小化。**民主的再分配作用：**中位选民的政策偏好会让高收入者被征收更多的税，并通过公共服务的形式补贴低相对收入者。

暗含假设：社会中高收入者是少数，高收入者对政府服务的需求较低。政治权利在法律上的平等：亿万富翁的一票等于穷人的一票。

5.6 民主制的其他作用

- **核心特征：**定期的竞争性选举
- **公共利益分配的决定机制：**中位选民的政策偏好
- **对政治家的问责机制**
选举的激励机制确保政治家履行竞选诺言，媒体监督、公民社会、公平的司法制度等（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差异）
- **政治权利交替的机制**
定期进行的选举，清晰的获胜和交替规则（不流血的革命）（非民主情况下的规则：暴力）

5.7 民主制度运转的现实

中位选民是强假设下的抽象理论模型，由于人是**有限理性**的，选民未必对不同政策利弊有清晰的认知，未必对自身偏好有清晰的认知。因此：

- **利益集团可能会通过塑造情境影响甚至扭曲人的偏好（Framing Effect）：**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政治广告、宣传和改变议题的表述方式，影响选民对政策的理解与判断。
例如，美国政治顾问 Frank Luntz 曾建议：
 - **Estate Tax → Death Tax：**将“遗产税”称为“死亡税”，使公众更容易产生负面联想，从而提高对废除遗产税的支持。
 - **Global Warming → Climate Change：**建议用语气相对温和的“气候变化”替代“全球变暖”，以降低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紧迫感。
- 人们可能**注重眼前利益**而非长远规划（重消费，轻积累）
- 政治家在宣传的时候会有意**隐藏成本**（如税收、债务问题等）
- **个体理性与群体的不理性：**中位选民的偏好加总未必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“好政治、坏政策”

注意：

1. **单峰偏好假设未必成立**：现实中选民的偏好可能是多峰的，政策选择也往往是多维的（如税收、福利、环境保护等），并且涉及不同的价值判断，因此很难将所有人的政治立场排列在同一条政策轴上。
2. **个体偏好未必能够加总为一致的社会偏好**：即使每个人的偏好都是理性且具有传递性的，多数决也可能产生循环偏好，即**孔多塞悖论（Condorcet Paradox）**。

例如，三位选民对政策 A, B, C 的偏好分别为：

选民 1: $A \succ B \succ C$

选民 2: $B \succ C \succ A$

选民 3: $C \succ A \succ B$

两两多数决的结果为：

$$A \succ B, \quad B \succ C, \quad C \succ A$$

即出现**集体偏好的循环**，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决结果，最终选择可能受到投票顺序的影响。

启示：选举民主侧重于对既有偏好进行投票和加总，但这种加总未必能够形成一致的集体选择。因此，有学者主张引入**协商民主（Deliberative Democracy）**，通过公共讨论、理性论证和相互协商，使选民反思甚至改变原有偏好，而非仅仅将其机械加总。

政治极化对民主制度的挑战：

- 共识性分配政策的难产——进一步撕裂社会——自我强化的极化
- 政治问责的弱化
- **产生原因**：选举制度让简单多数 > 比例代表

民粹主义

- 大众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，某种意义上使得现代民主政治又回到了古希腊城邦时代。
 - 大多数人的暴政、蛊惑民心的政客
 - 政治家从说服精英到直接说服民众的回归
 - 广播与纳粹德国的兴起
- 现实制度设计中精英和大众的妥协